

芬芳
一叶做你的服务生，
是我的荣幸

□明前茶

奉命去采访一对医学界的大拿，夫妻俩都是博士生导师，教授，五十好几了，走起路来都像冲锋陷阵的战士，连二十几岁的研究生都跟不上的那种人。因为手术和会诊太忙，夫妻俩经常会面的地方是医院的食堂。

然而，我去到他们家，完全感觉不到他们在职业上的精明强势，相反，我感到到他们之间的松弛与温馨，以及那种“你推磨来我放豆，你挑水来我灌园”的和谐，以及完全不需要演戏给谁看的和谐与恩爱。

这天，他们难得有半天假，夫妻俩度过这假期的方式，是丈夫充当染发小工，妻子被他按坐在客厅中央，围上了一条白围单，头发像非洲姑娘一样一缕一缕扎起。他围着她转，认真在她耳后做预染实验；给她一面小镜子，扶她到家里的落地镜旁边，让她看脑后的那小撮头发颜色满意不满意；她觉得颜色偏红了，也许偏棕一些才更高雅？不然研究生们会觉得导师新潮得令人难以接受？做丈夫的十分笃定地微笑，说她的白头发更多了，以他替她做了20年染发小工的经验看，染成近乎酒红色能更好地遮盖白头发，以及发型的黯淡稀疏，也可以让整个人更精神。

妻子最终接受了丈夫的染发方案。染发剂涂上去，家里弥漫着淡淡的氨水味。丈夫戴上染发手套，解开原来给头发分络的橡皮筋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按摩妻子的头发，直至染发乳均匀分布在每根发丝上。

五十多岁的人了，一样被头发上染发乳揉出的小泡沫逗笑，一样惊讶于头发颜色在空气里的微妙变化。做丈夫的一刻也没闲着，不时用小毛笔蘸取剩余的染发乳，刷在需要补染的地方。那种认真，与山水画家画好了画儿，戴上眼镜补足不满意的细节一模一样。那场景，很有点当年周润发拍“百年润发”广告的韵味。旧式的绅士淑女的不急不躁，以及那种“我看你什么都合意”的相顾之美，把我看呆了。

博导妻子露出心满意足的笑，对我解释说：“这还是我们20多年前去美国进修时养的习惯：当时，医生收入不高，总想把有限的津贴都贴补长辈，自己互相剪头可以省不少钱。如今条件好了倒觉得，对方才是自己最好的美发师。偶尔在外面染发，竟然弄得头皮过敏。他听了以后都嗔怪说，为啥不等他出差回来再染，外面的小年轻哪有他细心。”做妻子的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前年，丈夫飞了15个小时从美国回来，发现妻子的头发又变得扁塌花白，不顾倒时差的困倦，立刻开始做理发店的服务生，“一染完他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染发手套都没有脱下来。”

年长的夫妻，为何情感永固，那是因为他们当年所经历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培养了“我甘愿做你的服务生”的互惠情谊。

如果年轻伴侣也领会这一点，他们将获得比父辈更触及灵魂的感动：当所有的服务都可以到外面买来时，我依旧乐意为你付出服务。这种触动是无与伦比的。它会像城墙砖缝里的糯米浆一样，缓缓流注，无声粘贴，弥合了平时因为过分忙碌产生的隙怨，使他和她之间的情谊，好像千年城墙，傲然屹立，牢不可破。



春色无边

沈如甘

辣

□朱朱

看过一部电影《别惹我》，郭富城扮演的男主播请陈慧琳扮演的女作家吃咖喱，女主边吃边龇牙咧嘴地喝水，没一会儿便看到自己的男友跟另一女票约会吃饭。女主怒目指责男主播有意让自己难堪，愤而离去后，男主跟印度店小二抱怨这场火药味的争执完全是因为咖喱太辣。看的时候笑出了眼泪，这场景跟咖喱的刺激有精妙的相契，简直太配了。

很多年前吃过正宗的咖喱，这边盘着高帽的黝黑老汉正在制咖喱，不远的餐桌上正吃咖喱大餐。没去之前在国内吃咖喱总是新鲜的，对即兴而来的表演赞叹不已。真正坐在那里的时候反而觉得不安，多如牛毛的调料盘里还有尚未

碾透的植物残渣，跟吃草似的。整个胃都很抵触，仿佛有一只大手，把食物的味道都抵挡在外。真正热爱的吃，跟恋人的拥抱相似，身心契合美妙无比。而敷衍的浅尝辄止，就像相互嫌弃的男女不得不行的拥抱礼，如同受罪。在潮热的海边吃咖喱也是如此，吃一口就被湿气重重包围，烦闷得让人不想动弹。

印度洋波涛汹涌的海边有一家极具风味的餐馆，半敞开式的装修风格，来得早的人能坐临沙滩，褐色的长条桌和椅子木纹深刻，沧桑得仿佛历经百年似的。吃了5天的咖喱，整个人变得焦躁不安，一张口就能喷出火来。邻桌有位短发的大妈从布兜里掏出一瓶东西，定睛一

看，原来是老干妈。于是派桌上最年轻帅气的小伙儿拿着碗跟小勺去交涉，大妈甩出一口利落的川音，“吆次载睐！”于是乎，那天的晚餐让一桌人松了口气，仿佛这几日飞出去的魂魄又回来了。

作为一个半吊子的湘妹子，其实都没好好吃过辣。回湖南都被当成客人，顿顿迁就江南的口味，一点滋味都没有。只有一回，在姑妈家的小女儿家，一桌子重口味，除去他们寻常吃的辣味以外，还有浓浓的中药味，依然没找到感觉。四川与湖南虽然都吃辣，但辣的品格完全不一样。湖南的辣是干辣，四川人喜欢在辣里加上麻。假如那部电影里的男主播请饭的地点是四川小火

锅，估计会当场打起来。

有两个朋友超爱小火锅，双休日按捺不住直飞重庆枇杷山，在整座山都是密密麻麻小火锅店的包围下终于辣得满头大汗、大快朵颐。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还真是有点儿意思。那位朋友的性格爽脆，后来细问，他的奶奶是成都人。

现在寻常人家要吃个啥都不算个事儿了，所以辣味也是随处可见，平时能过点小瘾的也无非是辣椒炒蟹、小炒肉、辣炒年糕，要么在早餐的面条里加点辣子而已，本地的火锅绝对辣得不正宗。都说人生的滋味有酸甜苦辣，辣被排在最后，仿佛是最不受欢迎的，吃辣也需要勇气，可一旦爱上，便会义无反顾。

中西贯通的袁正刚老师

□王其康

袁正刚(1918—2015)，江苏省南通市人，194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，江苏省著名中医，曾任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南通市分会副理事长，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，南通市中医学会常务理事，南通市科协常委，市人大代表，市政协委员，是中国首批获取中西医双学历的高端医学人才。袁老的大名，于我而言，早已如雷贯耳，但真正零距离接触，还源于抢救一个危重病人。

1982年，当时我仅是一名年轻的工厂医生，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进修(下文简称一院)。由于受“文革”的影响，那时一院的临床医生三级梯队(主任医师、主治医师、住院医师)，不像现在这么完整。年轻的住院医师很少，进修医生就承担了住院医师的职责。夏天某日，我分管的床位，来了一位某中学女教师，诊断是“支气管扩张伴咯血”。起初几天，患者咯血不严重，全身状况尚可，血色素10克左右。经过使用抗炎、止血措施一周后，症状基本控制了。就在病人准备出院前一天夜间，突发大量咯血，急症处理后，稍有控制，但并未彻底。在后来的半个月中，病人呈反复咯血，而且间隔期越来越短。内科易主任、黄主治医师每天关注病人的变化，在用了多种止血剂后，效果不理想，血色素仅5.8克，几乎是人的下限。无奈之下，请外科会诊，是否可以手术止血。外科主任张臣楠会诊后，认为诊断正确，但病人处于活动性出血期，不具备手术条件，必须先内科止血，纠正血色素，而后转外科手术治疗。张主任建议用“输血止血”的方案。矛盾又一次回到内科，经科内集体会诊，决定按外科的方

案处置。输血两天后，每天咯血次数明显减少。但两天后逐渐出现了奇怪现象，即输血后咯血停止，输血完成后不久再次出血，且量在一次比一次增加，最多一次咯出了500毫升。易主任、黄主治医师都是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，面对这个病人，也是一筹莫展。黄主治医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(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)，与全国著名的呼吸内科专家、上海瑞金医院的邓伟吾教授是学友，经与院方和家属共同商定，邀请邓教授会诊。邓教授在检查了病人后，又仔细查看了病历，对诊断及现有的治疗手段，均无异议，仅提出了输血要“多次少量”的四字建议。这四个字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了，一字值千金。简单地说，病人被扩张的支气管，现犹如千疮百孔的自行车轮胎，若每次大量输血，恰如对刚修补的轮胎大量充气，这样会将刚修的胎撑破。而多次少量充气，则能起到既“补胎”又不“破胎”的作用。按邓教授意见，通过修正输血方法后，病人不再大咯血。但一天数次咯血仍不见好，血色素也上不去，全身状况很差。易主任及黄主治医师担心病人贫血时间过长，会引起其他脏器缺血缺氧，导致出现更坏的并发症。经过讨论，他们决定请擅长中医急重症的中医科主任袁正刚会诊。

袁老个头不高，虽说六十多岁，但精神矍铄，深邃的目光里，伴着温和的暖流。他迈着稳健的步子，走进病房，先凝视了一会病人，又翻看了病人的眼睑，细看了病人的舌苔，接着从随身带的包里，拿出脉枕垫在病人的手腕下切脉。脉枕所起到的作用，是为了在切脉时，让患者手

腕舒适放松，以便能让医生更好地触到脉搏。俗话说三根手指一个垫，切脉时二者不可缺一。袁主任边切脉边轻言细语与病人交流：“胸闷心慌气短吗？”“食欲怎样？”“大小便怎样？”“头晕目眩吗？”等等。切完脉，袁主任又用西医查病人的触叩诊方法，检查了病人的心肺肝脾，最后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心脏，才完成了临床物理检查。接着，他认真看了病历，逐页过目。最后，他与易主任、黄主治医师进行了讨论，我做了会诊记录。袁主任认为，该病人长期出血，血色素极低，面色苍白，语气无力，舌胖偏白，脉细而沉，辨证属气血两亏，里寒虚弱，拟用“四物汤”“四君子汤”加减为两帖，配了单味红参泡茶饮服。“四物汤”主治血虚，“四君子汤”主治气虚，配红参茶饮，提高免疫力，用袁主任话是“加点煤球还要用扇子扇风。”他建议易主任弃用输全血，改为成分输血，仅输红细胞及血小板，既“多次少量”，又有明确针对性。两天后，袁主任再次到病房看病人，见病人精神有所好转，咯血基本止了，嘱查血色素，报告为6.3克，明显上升。袁主任大为喜悦，微笑地又开了三帖中药，原方作了加减，继续喝“红参”茶。经过约一周中西医治疗，这个病人咯血终于停止，血色素上升到6.9克，后转至外科手术治疗。2003年这所中学校医告诉我，病人一直还健在。

从这个病人的治疗开始，我不仅认识了袁老，还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，他总是有问必答，引经据典，结合临床，不厌其烦地传授。再后来，随着不断接触，我还知道了一些除了精湛医术外，有关他的其他故事。

1952年秋，国家卫生部首次招

心窗
片羽玉兰
一瓣

收医学人才，其中专门从各省招收了45名优秀的中医师，进行“中西医”的培养。袁老师经考试合格，被北京大学医学院录取，进行了5年西医的专业深造。在外人看，这是很光鲜的事，对袁老师而言，其实损失了许多。当时他上有老下有小，已有4个子女。若去北京深造，除了不能照顾家庭外，光5年工资收入，就损失七八千元(当时他每月工资110元，每年拿15个月工资)。在当年，这笔钱能买下一个大宅院了。不少人劝袁老师“三思而后行”。袁老淡然一笑说：“我已决！”在以后60余载的从医道路上，每每回顾当年冲破重重阻力，决心赴京深造学习的决定，无限感慨的说：“赴北京学习就是再造一个袁正刚。不仅值得，而且必须。”正是基于此，他为立足中医，实践中西医结合，实现优势互补，为探索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作出了无私的奉献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袁老尽管曾受到冲击，被下放到农场，蹲过牛棚、睡过地铺、烧过锅炉、拉过板车……但他在逆境中，从未动摇对祖国中西医事业的执着追求。他为人正派正直，不趋炎附势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，任劳任怨，而个人的生活极其简朴，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。1975年，袁老离别工作20年的南京调回南通工作时，全部家当仅两只装满书籍和资料的旧木箱。

自古以来行医者十分注重道德修养，将“大医精诚”奉为圭臬，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着。而袁正刚老师是以德养性，以德修身，德艺双馨的代表。也正因为他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，才成就了一代名医。

(感谢袁乐平先生提供相关资料)